



摆正姿态

江飞

洞察时代

中国式科幻表达再攀新高度

——《流浪地球2》的深刻思想

程波



《流浪地球2》海报

机与战斗机的大战，一场恢宏的序幕拉开的方式本身就构成了故事本身。

同时，图恒宇的出现引出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550W的线索，其镜中反写“MOSS”不仅在刘慈欣《超新纪元》《中国2185》中出现过，还在一些细节上与世界经典科幻电影的超级计算机产生互文，比如《2001漫游太空》《阿尔法城》，当超级计算机红点眼睛或摄像头闪烁的时候，就会有隐约的提示音出现，像是计算机在观察和监视着人类。

以550W代表的人工智能的双面性，或许就是两次危机的深层原因，这是一个技术伦理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哲学问题，甚至就是一个未来的现实问题。

“月球危机”是《流浪地球2》的核心情节，如果说刘培强的线索是直接向前追溯的“真实宇宙”，那图恒宇或许可以说是一条“元宇宙”线索，虚实与生死原本是对立和非此即彼的，就像2044的危机一般，但在全人类的危机面前，不同国家的人需要也可以团结，因为“没有人的文明，毫无意义”，当人类的眼界不够时，个人或群体会追问“公平”的问题，但在“人的尺度”上，更多的是“责任”。

核弹用于摧毁月球，这是一个维度上的团结与信任，但密钥没法解开，这就是更高维度的分裂与猜忌，只有用更大的人性的牺牲、亲手的操作才会有团结的意义。同样，虚与实能否团结？真实世界的刘培强与虚拟世界的图恒宇的初心都是“小我”，人性中的责任和善良成为最终选项。

这不是个人英雄主义，这是有“人”的集体性和人民性。

就像图恒宇虚实的穿越如同通过黑洞的“星际穿越”一样，成为了更高维度的自己，可以发回提醒人类的警告危机的信息，在天使和魔鬼的选择中，本性的延续就是自己的神。从这个意义上，2500年的愚公移山般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进程中，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不应该包括虚实的团结？可不可以超越生死？答案似乎是肯定的。

《流浪地球2》在吸收世界科幻电影营养的开放性中，进一步诠释和深耕了主题——“中国式方案”。与现实的联合国几乎别无二致的科联合政府里，中山装上别着国旗的消瘦的“周老师”讲着人类第一根愈合的大腿骨的故事。是的，这个人物姓周，他能唤起中国人的集体记忆，他面对潮汐危险和监控镜头，能果断地做出系列相信“我们的人没问题”的决断，这样的“最后一分钟营救”套路似乎也是我们自己熟悉的方式。

《流浪地球2》显然体现了中国电影工业制作水准到达一个新高度，特效镜头真实又充满细节。“太空电梯”“月球核爆”“重回上海”“潜水重启互联网根目录”“太空站勇士出发”“机器狗笨笨”等段落的硬核程度，放在世界科幻电影的历史中 and 最前沿，毫不逊色。

在叙事与特效的结合上，所谓情感戏与硬核戏的结构和节奏上，虽不能说完美，但也基本做到了趋于紧凑和有效。《流浪地球》和《流浪地球2》彰显了中国电影从当代IP中孵化自己的系列电影的能力，而且在创意和手工艺的結合上、在主题的开掘和阐释上、在中国电影“走出去”乃至更有效的国际交流上，都找到了中国式的方法，这些都是具有全局性和示范效应的。

前传如何成为续篇？系列电影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每一部都应该是新的“这一部”，而不仅仅是某一部的前作或续篇，不应是所谓“一生二、二生三”的节奏。

科幻何以能够硬核？人物和故事首先要立得住；然后视听真实感与奇观性要足够，如果能利用新技术、新平台则更好；再者能否从“幻想”向“思想”跃升，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的探讨寄寓在视听和故事之中，却又并不封闭，能启发追问和反省。

如果说，2019年的《流浪地球》公认为中国科幻电影的“开窍”和“天花板”，那么2023年春节档，作为这个系列电影第二部的《流浪地球2》，讲的是《流浪地球》前传故事，却以超越前作的硬核水准，着实将中国科幻电影的天花板又向上提升了一大截。

从故事上说，《流浪地球2》正面呈现了《流浪地球》的基本世界观架构是如何产生的，以及木星危机之前的两次危机——2044年袭击和2058年月球危机。

这是由当下向未来迈进过程中的阶梯，是从近未来向更远处去的阶段性状态。“流浪地球”计划是一个宏大的、跨越2500年的人类史诗，其何以发生、何以可能，可信性逻辑需要电影进行展现。

2044年的危机表面上看是主流的“流浪地球”派面对反对派“数字生命”派的“恐怖袭击”如何应对，这是谍战和惊险动作片的套路，但同时完成了对刘培强和韩朵朵的人设构建。在刘慈欣《三体》中面壁者的“太空电梯”构想变成了《流浪地球2》里的视听现实，辅之以无人



我是故乡的一株麦子

王俊才

1968年的一个冬日，我出生在山西灵石县一个偏僻的小山庄。山庄地处黄土高坡，有沟、有坡、有梁、有窟。沟地种玉米，坡地和塬上种小麦。每年夏收，龙口夺食，割麦、担麦、打麦等场景如果入画，一定特别壮观和精彩。从懂事起，我就开始见证一株麦子的生长，当我能用诗歌表达的时候，突然发现，我就是一株来自故乡的麦子。

十年前，我曾用一部长篇小说为自己的村庄命名了一个全新的名字：桃柳坡。桃柳坡只有20来户人家。也许从小没有见过“世面”的缘故吧，我的性格一直很内向，而读书的兴趣越来越浓，常常坐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场院里，把头扎进书里，几乎忘了身外的世界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回家务农。随后的两年多时间，我炼过焦，放过羊，扛过砖，繁重的体力劳动磨炼了我，我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，感受到了生活的不易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看了《春风》杂志社有一个文学讲习所，非常惊喜，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梦想成真的“作家摇篮”，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一年80元的学费省了过去，并坚持学习了4年。每个礼拜，我都能收到远方的书刊、信件。每周往返一次的邮递员，成了我的期待。那段时期，我将不成熟的作品一篇篇地邮寄出去，大都石沉大海。唯一的收获，是在讲习所的教材上发表了几个“豆腐块”。本以为文学梦即将破碎，我的第一篇小說《路》在《山西教育报》发表，第一篇诗歌《怀念》在《山西成人教育》发表，让我又踌躇满志起来，再次拿起了笔。

成家后，我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。不知不觉，文学梦渐行渐远。1996年，为了命运能有一个转机，我背着干粮来到县进修校学习。在这里，有幸遇到了我的文学恩师孟繁信老师，在孟老师的引荐下，见到了时任县文联主席的畅玉杰老师。畅老师主编的《天星》报给予我莫大的鼓励。我的文学梦又浮出了水面。1998年，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畅老师帮助我自印了诗集《孤旅》。《孤旅》是一部文字粗糙的诗集，但它也是我内心最细腻、最真实的表白。感谢诗歌，是它让我扛起了生活的重担。

2005年，我调到县文联，同时借调至县文史研究会担任编辑工作，创作环境一下子变得好多了。后来相继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静升王》、第二本诗集《遥远的乡村》、第二本长篇小说《桃柳坡》。2019年，我的第三本诗集《农谚里的麦子》出版。2020年，在忐忑的

多元写法推动艺术发展

段崇轩

小说创作方法今天已成为“冰点”问题。文学理论教程中基本取消，文学理论界也似乎避而不谈。但创作方法作为一种认识和表现生活的总则与路向，它始终在支配、制约着每位作家、每篇作品的写作。

《文学理论基础》中认为：“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，在如何看待生活，采用什么样的艺术手段塑造形象等一系列方法步骤上，各人所持的态度和遵循的原则是不相同的，于是就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创作方法，如，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、古典主义、自然主义、唯美主义、印象主义、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等。”一个时代的创作方法，只有多元共存、竞争的态势下，才能推动整个文学的健康发展。如果单强调某种方法，很少谈其他方法，不仅使多样的创作方法得不到成长，其自身的壮大也受到限制。创作方法有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、现代主义等。而在现代主义方法中，又包含象征主义、未来主义、荒诞主义、意识流等。表现主义是现代主义中的一种，它是一种创作方法，更是一种创作思潮和技法，它特别强调创作中作家主体性的实现，主张充分展现作家的感觉、感情、思想、精神等。每一种创作方法都可以吸纳、运用表现主义方法和技法。新时期文学倡导创作方法的改革开放，在体现作家的主体性上有全新的探索与突破，但并没有明确提出表现主义思想与方法，今天我们需要重温表现主义文学理论。

在2022年的短篇小说中，现实主义显示了它的不断成熟与精进。现实主义仍然具有强劲生命力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潘向黎的《兰亭序》写的是退休知识分子夫妻俩，邀请被儿子甩了的女孩吃饭。在故事的展开、演进中，显示了老一代与青年一代不同的婚爱观，老夫妻俩对女孩的喜悦、愧疚、关爱，女孩的悲伤、感动、自尊。三位上海人性格的细腻、内敛，修养的丰富、高雅，写得精深入微。笔者欣赏之余隐隐觉得这些作品不仅环境、人物黯淡，而且创作方法守旧。回到现实主义、古典主义没有错，但如果不汲取一点新的观念与方法，作品会不会偏离时代精神、疏离读者审美呢？潘向黎的新作似乎没有超越她的旧作。

现实主义创作，适当借鉴其他创作方法，会呈现新的面貌和特质。凡一平的《上岭产婆》，是一篇描写乡村生活的现实主义之作。上岭村的接产婆王美琴，40年接生孩子无数，在山崖上划下一道道生死和死的横杠竖杠。临终时，她洗漱干净，留下欠欠账，悄然逝去，众多的乡亲们来祭拜她，特别是由她接生的那些孩子们，哭喊着“妈妈”。小说的笔法无疑是写实的，但在情节选择和氛围营造中，又不留痕迹地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，耸立起一个清爽俊气、一生行善、自尊自爱的母亲形象。海勒根那的《呼伦贝尔牧歌》，写一位年轻牧民与草原姑娘的曲折爱情，第一书记的热心牵线，使二人破镜重圆。曲折的爱情故事与壮阔、美丽的大草原，给写实的故事平添了浪漫主义色彩。其实象征主义、浪漫主义等手法的借鉴，并不需要刻意地施展，典型情节的选择，自然环境的渲染，作家感情、思想、精神的抒发，就可以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景来，进而丰富和提升现实主义小说的品格。

外国文学专家袁可嘉评价说：“各个文学领域的表现主义者虽然也各有特点，但又具有一些基本类似的倾向和共同手法；他们不重视对外的客观事物的忠实描绘，要求突破事物的表象而表现事物内在的实质，要求突破对人物行为的描写而揭示其内在的灵魂，要求突破对暂时现象的抒写而展示永恒的品质或真理。他们笔下的人物往往是某些共性的抽象和象征；他们经常采用内心独白、梦境、假面具、潜台词等手法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。”概而言之，表现主义方法和手法，重视的是精神，而不是物质，重视的是作家主体，而不是所表现的客体。现实主义小说可以用，现代主义小说也可以用。

残雪是一位新时期文学以来矢志不移坚持现代主义写法的作家，另一位应该是吕新。但可以发现，残雪近年来的短篇小说，情节、环境、人物等多了写实成分，但思想意蕴依然是深奥的、现代的。《蛤蟆村》是一篇现代派小说力作，作品描绘一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弟“我”——金八，由父亲的朋友送到外地当拉煤工。这位知青跟着神秘的黑衣去寻找银河系，高压环境下依然有青年海阔天空的想象。作家用表现主义抒发了自己的感觉、心理、意识流等精神活动。

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有机融合，可以形成一种现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，这种方法不少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，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。曹军庆的《舞台》，描述主人公彭乙为了生存做过各种各样的杂活，却很不成功。他突然奇想为自拉自唱者伴舞，男扮女装，尽情表演，想不到竟成为全市的网红。正当他满怀信心筹划去商演、去赚钱时，街道办却要他送到精神病院。这一故事本身就是写实的，但又极富荒诞性，作家很好地利用了其荒诞性，深刻揭示了社会环境对人的隐私的窥视、严苛，小人物生存的压抑、艰难。范小青的《看见》，用喜剧的方式写荒诞，荒诞中蕴含着社会人生哲理。公司职员艾可有学霸的脑子，但却长了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。在他没有做近视治疗手术之前，他眼中的世界是朦胧的、美好的。他与大家和谐相处。但在手术之后，他看得清楚、工作认真，反而觉得世界是错位的、人心是巨测的，屡受人们责备、领导批评。在真实的也是荒诞的描写中，折射了社会的复杂、微妙。

创作方法说到底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法，最关键的还是作家的主体意识、思想境界。最本色的现实主义同样可以写出浓浓的诗意味。韩东的《诗会》是一篇“有原型的，有原始事件”的纪实小说，描述记者晓华所经历的母亲去世与殡仪馆举行诗歌朗诵会的全过程。语言平实、简洁、蕴藉，但却烘托出一个儿子在母亲去世前后的悲伤感情，是诗人们对一个平凡而坚强的母亲的真诚礼赞。写实的、诗意的、表现的，尽在其中。

③

“赵树理文学奖”获奖者创作谈 ③